

■新书推荐

# 《仪式与社会：商代晚期祭祀遗存的考古学研究》序

方辉

考古学是以古代实物遗存来研究历史的学科,因此实物遗存是考古学研究的基本对象,也因此研究器物及其所反映的技术一直以来是考古学研究最为重要的任务之一,所取得的成果也最为丰硕。由此往上,通过实物遗存研究古代的社会,尤其是古代意识、信仰等精神领域,则是难上加难。这是学界的共识。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部《仪式与社会：商代晚期祭祀遗存的考古学研究》,是杨谦在其同名的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写成的。回过头来看,当时商议以此选题进行论文写作,坦率而言,还是冒了一定的风险。因为大家知道,商代晚期祭祀遗存主要分布在安阳殷墟,自1928年殷墟发掘至今,所积累的考古资料异常丰富,商史、古文字学方面的研究成果甚至更多,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这样一篇博士学位论文难度很大。另外,无论是考古学界还是历史学界,对祭祀遗存的研究较多,而关注仪式问题的则相对较少,我希望杨谦在这方面做些探索。事有巧合,杨谦在博二时获得哈佛燕京学社访问研究员项目资助,赴哈佛大学学习文化人类学相关课程,并有机会到中美洲考古遗址,而以玛雅文化、阿兹特克文化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中美洲考古,一直以来便长于祭祀、信仰、仪式等相关问题的研究,文化人类学、宗教人类学理论成果丰富。这对杨谦来说无疑是个难得的学习机会。

尽管如此,研究商代晚期的仪式与社会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首先是如何理解和认识商代甲骨卜辞中多达数十上百种之多的祭名、祭法,甲骨学界虽然成果很多,但观点分歧很大,与考古遗存相对应尚有很大难度。如何破解这个难题?作者的做法是聚焦考古遗存,从考古资料出发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事实证明,这种方法是可行的。

作者首先借鉴文化人类学有关仪式研究的相关理论方法,注重分析仪式发生的地点、时间、成员、用品、目的等组成要素,并从仪式逻辑所具有的不符合技术常理的“非理性”特点,作为甄别仪式遗存的理论指导。

接着对殷墟及殷墟以外商代晚期的祭祀遗存进行了全面梳理,在此基础上对祭祀仪式做了分类研究,共分为宗庙王陵类仪式、建筑营造类祭祀仪式、手工业作坊类仪式和其他类仪式等,之后分门别类加以分析,所涉及的分析因素和变量包括用品的种类选择(如人性、动物牺牲、器物和其他),用品的处理方式(如砍头、肢解、毁器、焚烧、铺洒朱砂、土埋),用品的获取途径(如外来的纳贡、战争、狩猎,当地自产物品)。以上因素或变量,比较不同类型祭祀仪式之间的差异。这些因素或变量都是以实物遗存的形式出现的,且数量很多,因此分析便具有了统计学上的意义,如作者指出,相较于其他类祭祀仪式,宗庙王陵类祭祀仪式用品的种类最为繁多,且使用了最为珍贵的野生动物,而且,成人牺牲几乎主要见于该类仪式。

在对祭祀仪式地点选择和仪式群体的分析中,作者根据甲骨卜辞及相关文献记载,指出商王负责王室祖先的祭祀仪式,贵族族长也具有对其家族祖先的主祭权;建筑营造类祭祀仪式的举行者则要复杂得多,几乎包括了所有不同等级的成员;而手工业作坊类祭祀仪式的主持者,因为生产技术被视为一种秘密技术知识,被严格限制在主管职官或工头手中。这些都是以往研究者所疏忽的地方。

“祭祀仪式地点密集度”无疑是聚落空间位置分析法析出的一个新概念。作者通过殷墟祭祀仪式遗存的分布,并不意外地得出殷墟的祭祀仪式地点主要集中在小屯宗庙宫殿区和王陵区两个区域的结论,但作



者并未停步于此,而是进一步比较了仪式核心区和非核心区在仪式用品上的差异,认为前者所发现的成人、动物、青铜器、玉石器、贝蚌、甲骨等的数量要远远多于后者,而后者仅在儿童、陶器等仪式用品上多于前者。而且,金器、珍稀动物仅见于仪式核心区。作者进一步分析指出,仪式核心区的仪式用品在处理方式上具有一定的“表演性质”,如砍头、肢解、毁器、跪葬、使用朱砂、焚烧行为等,目的是在视觉感官上产生一种威慑力。

对于殷墟以外商代晚期的祭祀仪式遗存,本书也有不同程度的涉猎,有的还是最新的考古发现,如三星堆祭祀坑等,作者同意使用“祭祀器物掩埋坑”或“祭祀遗存坑”称呼之。

本书对于“仪式”的分析占了绝大部分篇幅,而对“社会”的探讨只用了最后一章,分作宗教思想、政治目的和社会影响三个小节,分别探讨了仪式背后的宗教信仰、商王统治的合法性和维护族群之间的团结等内容。这样的篇幅显然有些小了。这无疑给读者留下一个期盼,商代祭祀仪式与社会究竟有着怎样的关系?我们共同期待作者杨谦继续沿着这个课题做深入挖掘,奉献更多的见解。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仪式与社会：商代晚期祭祀遗存的考古学研究》

作者:杨谦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3年4月  
定价:78元

# 盼望六十年的一部书

——《辽阳壁画墓》读后

董学增



在考古工作中,墓葬考古占绝大部分,然而在发掘的数以千万计墓葬中壁画墓却数量不多,尤其是汉、魏、晋时期的壁画墓更少,据报道已知经过考古发掘的这一时期的壁画墓,全国仅有60多座,基本分布在我国北部和中西部几个省、自治区,这其中就有辽阳壁画墓20余座,而且分布比较集中,故1961年3月4日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称之为“辽阳壁画墓群”,从此辽阳壁画墓闻名中外。但遗憾的是,由于发掘墓室后都即时封存,至今没有打开过,壁画究竟什么样子?除发掘人员外谁也没见过。虽然事后发表一些简报,但由于当时受彩色印刷条件的限制,随文图片都是现场摹画的,或只有线图,读者不能欣赏其采用矿物颜料以“没骨法”绘成的精美绝伦的壁画,因而具有极高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学术价值的绘画文物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实为憾事!

幸亏我的老友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冯永谦先生将他当年拍摄的壁画墓彩色照片精心地保存了下来,并对辽阳壁画墓加以综合整理研究,写就了《辽阳壁画墓》一书,在“国家出版基金项目”的支持下,于2021年6月由辽海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填补空白的考古学著作,读后受益良多,故乐于向读者介绍。

该书为16开精装本,47万字,书的最后单辟一章收入辽阳壁画墓彩色照片图版70张,计139幅(另有大量文中壁画插图、器物照片和线图)。本书共分五章,第一章为绪论。概述了作者亲自参加壁画墓发掘的历程及本书的要意,以及辽阳壁画墓群公布为国保单位后的保护状况。

第二章简练地陈述了辽阳附近的自然地理、历史沿革、辽阳壁画墓的发现情况。

第三章详细地介绍了辽阳市十五座具有代表性的后汉、汉魏、两晋时期的壁画墓,其中相当于后汉中晚期的壁画墓有:辽阳旧城东门里壁画墓、北园一号壁画墓、棒台子一号壁画墓、三道壕车骑壁画墓;相当于汉魏之际的壁画墓有:三道壕一号壁画墓、三道壕二号壁画墓、棒台子二号壁画墓、鹤房一号壁画墓、南雪梅一号壁画墓;相当于三国魏时期的壁画墓有:北园二号壁画墓、北园三号壁画墓;相当于西晋武帝太康年间至东晋穆帝时期的壁画墓有:三道壕北窑场壁画墓、上王家壁画墓。

第四章介绍了辽阳壁画的特点。记述了墓室的建筑材料和墓葬的形制,即墓室当年都有高大的封土堆,地下室用淡青色页岩板石构筑,多为多室并有回廊。本章还重点地记述了国内各地发现的汉、魏、晋时期的典型的壁画墓,其中前汉末年至王莽时期的壁画墓有:河南洛阳烧沟卜千秋壁画墓、西安交通大学壁画墓、西安理工大学壁画墓、西安市郊曲江翠竹园壁画墓、内蒙古托克托古城冈氏壁画墓、洛阳金谷园壁画墓、山西平陆枣园村壁画墓、陕西千阳县壁画墓;相当于后汉时期的壁画墓有:洛阳烧沟一号壁画墓、山东泰安市东平后屯壁画墓、山东梁山后银山壁画墓、河南睢县打虎亭壁画墓、河北衡水安平县袁家庄壁画墓、望都县所药村壁画墓、河南偃师杏园村壁画墓、陕西靖边县杨桥畔壁画墓、内蒙古乌审旗巴日松古敖包壁画墓、和林格尔壁画墓、甘肃武威雷台壁画墓;相当于晋代(西晋、东晋)的壁画墓有:甘肃嘉峪关新城壁画墓、酒泉丁家嘴壁画墓。从以上21座壁画墓,可知其墓葬建材、结构、墓内随葬品、特别是壁画的内容、人物形象和作画颜料等与辽阳壁画墓的异同。

本章最后一节主要讲了对辽阳壁画墓的认识。辽阳壁画墓现已发现近30座(不包括因地上封堆不见而未发现者),而且相当集中,这与辽阳的历史状况有关。据司马迁《史记》记载:战国燕时,“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辽东郡的首府设在襄平,即今辽阳,其位置在今辽阳市内的旧城区范围。襄平城即是郡治所在,自战国燕,历经秦、汉、魏、晋几百年的发展,一直到清代,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都是东北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后汉末期,天下大乱,群雄并起,后来形成魏、蜀、吴三国。当此之际,辽东公孙氏崛起,割据襄平,封侯称王,拥有辽东之地达五十余年。据《晋书·地理志》记载,襄平仍为辽东郡治所。近年在辽阳市旧城区一座壁画墓石壁上,发现刻有“太康九年”“襄平”等字更可证明其绝对年代。从史书记载和壁画内容推断,后汉、魏、晋时代辽阳壁画墓的主人,当为辽东郡的公孙氏或高官显贵、地方豪强、社会贤达等。

辽阳壁画墓与同时期国内各地发现的壁画墓最大差异有以下几点:一是辽阳壁画墓不仅分布集中,而且数量最多,发现最早,早在20世纪初就发现了。二是根据墓室特点、随葬物和壁画内容综合考察,辽阳壁画墓的年代跨度比较大,是从后汉中期开始,历经三国魏到两晋时期,前后历时达二百年多。三是辽阳壁画墓墓室均用巨大厚重的石板构筑,是其他地区所不见的。四是由于辽阳壁画墓是用南芬页岩石板构筑,这种页岩开采面非常平整光滑,而且壁画都是用矿物颜料直接绘在石面上的,益显壁画的艳丽、完整、精致,这是砖室墓壁画无可比拟的。五是辽阳壁画与同时代各地壁画相比,绘画水平最高,写实能力最强,绘人状物,无论静态、动态,表现都很出色。以三道壕车骑墓的“车马出行图”为例,出行车马排列整齐,秩序井然,壁画宽阔,场面极为壮观。绘画技法纯熟,笔划粗细匀称,形象栩栩如生。正是这些无名民间画家的绘画开启了后世知名职业画家绘画的先河。

辽阳壁画内容题材,多表现墓主人的经历和生活,反映了“事死如事生”的理念。除了墓室形制和随葬品而外,更多地反映在壁画的画面之中,“画面”以人事言有:宴饗、伎乐、斗鸡、仓廩、车舆、仪仗、神话各事;以物言有:楼殿、车骑、犬马、麈尾、旌幡、乐器、食器、冠履、刀剑、树木等物。(见本书第三章转载的著名考古学家李文信先生于1947年10月10日发表在《国立沈阳博物院筹备委员会汇刊》第一期的《辽阳北园壁画古墓记略》一文),李先生对画面的名称做了详考,使读者增长了诸多文物知识,受益匪浅。

第五章为辽阳壁画墓彩色照片图版。其中有辽阳旧城东门里后汉壁画墓(见插图异兽图)、辽阳棒台子一号后汉壁画墓(见插图伎乐图)、辽阳三道壕后汉车骑壁画墓(见插图车骑出行图)。包括画面全景式彩照,局部特写彩照,形象皆准确、鲜明、生动、耐人寻味。

此书以后汉中期至魏、晋时期的辽阳壁画墓为中心,同时记述了同时期全国各地的壁画墓,从这个角度可以说它是我国汉、魏、晋时期壁画墓的大型工具书。

本书著者冯永谦先生,1954年“东北博物馆文物考古干部训练班”毕业后,一直潜心从事文物考古工作。其研究的重点为中国历代考古、辽宁文物、东北历史地理、辽代陶瓷、红山文化玉器、辽代铁器等,出版专著18部,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一些论著曾获多项学术研究成果。笔者在《中国文物报》2005年7月6日,曾以《勤奋造就的考古学家——中国辽金暨契丹女真史学会会长冯永谦》为题,介绍过冯先生。现在看来此文不虚。笔者是1953年“东北博物馆文化考古干部训练班”毕业,与永谦先生可以说是不同届的同窗,然而学术成果却自愧不如,在这里我要向冯先生学习,见贤思齐。

(作者单位:吉林市博物馆)

《辽阳壁画墓》

作者:冯永谦  
出版社:辽海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1年6月  
定价:180元

# 考古学视角下的长江中游商代区域文明研究

李朵

长江流域区域文明研究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演进格局研究的重要组成。早在史前时期,长江中下游就先后出现良渚文化、石家河文化等多个区域中心文明;至商时期,长江中上游的广汉三星堆、新干大洋洲、洞庭湖周边等多个地点或地区都发现有地方青铜文明。长江流域的文化背景、社会形态、文明化进程、动力机制、互动交往,以及此区域文明如何参与中华文明“一体化”进程等都是备受关注的热点问题。

西北大学豆海锋教授的《冲击与调适：长江中游商代文化与社会演进的考古学观察》一书,便是近年来运用考古学方法,研究商代长江中游区域文明的重要成果。作者长期耕耘于长江流域商代考古研究,参与当地田野考古工作,对材料非常熟悉,目前已发表系列研究文章,这本书是其中最为系统的代表性成果。长江中游凭借地势开阔、铜矿资源丰富、水陆交通便利等自然地理和资源优势,长期处于中原与长江流域之间,以及长江流域内部文化、经济、政治交往的核心地带。区域内文化面貌复杂,阶段性变化显著。书名中的“冲击”与“调适”,主体分别是外来者和土著,揭示出商代此区域内文化与社会发展的关键特点,即多元文化碰撞和本土调适之间的相互作用。

基于对相关考古材料的全面收集和系统研究,书中构建起长江中游商代考古学文化的时空框架,理清了区域内的文化序列和谱系关系。结合文化因素构成的动态变化,考察了文化演进的方式和特点,以及不同文化间的互动关系。结合自然地理环境,运用陶器风格追踪到文化交流的具体路线。扎实的材料分析,层层推进的论证,准确勾勒出长江中游商代文化的动态演进史。该书将长江中游商代遗存整体划分为五期十段,分期与中原商文化分期体系相对应,为跨区域文化互动的讨论提供了年代基础。依据自然地理区划和文化特征,将长江中游分为三大区域:江汉地区、洞庭湖和鄱阳湖水系区。三个区域内又被细分出18个小的地理单元。该书详细揭示出发展不平衡的各个单元内的文化序列和演进路径。并且阐释了差异形成的原因,除本土地方传统影响之外,更重要的是各单元受中原商文化影响方式和交流程度的区别。

书中对考古学文化地方类型的区分是多层次结构的。比如意生寺类型、铜鼓山类型和龙王岭类型,被判断为商文化盘龙城类型的次级类型。这些遗存主要分布在早商时期的江汉东部及邻近地区。多层次结构的划分,不仅使考古遗存的性质判定更为准确,也为文化现象背后动因的讨论提供了结构性的证据。结合次级类型的选址特点,书中还对中原商王朝在长江中游的经略方式提出了重要推理。此外,书中是以更宏观的时间尺度来考察区域文化变迁的,对各分区内史前时期至夏代的文化演进情况也有考察,也因此取得了一些重要认识。比如江汉东、西部的盘龙城、荆南寺遗址是早商时期中原王朝在长江中游最早的经营地点,两处遗址内均发现二里头文化因素。以往将这些聚落遗址的目的,解释为获取铜矿资源和掌控交通要道,而书中补充了从政治层面考量的可能,即“镇压属于原夏王朝的部落或追随者的作用,使得商王朝拥有与夏相近的疆域领土”。

这本书是豆海锋教授在其博士论文《长江中游地区商代文化研究》基础上的补充和深化,新增对社会形态的专门讨论。从文化格局演变、聚落结构、青铜礼器使用、手工业生产等多方面着手,详细讨论区域人

群结构、社会变革、社会分层和分工,以及宗教礼仪发展水平等问题。书中指出商代长江中游并未形成“整个区域稳定的社会结构”,只有部分区域形成有多层结构的聚落,并将其总结出三种模式。早商时期中原文化和人群的南下,打破长江中游原有社会结构。在江汉地区形成“盘龙城模式”,其社会分层结构、礼仪制度和技术水平都与中原商王朝相近,性质属于“军事色彩浓厚的直辖区”。晚商时期分别在赣江中游、湘江中下游出现两处区域中心,分别属于“吴城模式”“宁乡模式”。两者的社会分层相较于“盘龙城模式”要简单,但均有本地特色突出的文化和宗教礼仪。其中,宁乡模式结构不清,性质暂不明确;吴城文化发现吴城、牛城这两座城址,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布局结构特殊的吴城遗址究竟是方国都城,还是具有手工业生产或祭祀等专门用途的邑等等。

其二,早商时期中原王朝在长江中游的直辖区,给当地社会带来从文化、技术到意识层面的全面冲击和影响,直至晚商时期长江中游流行的本土器物仍保留早商时期的技术或风格,这部分书中也有论及。问题在于如何区分,哪些是早商时期影响在当地时段内的传承和演进所导致的,哪些是出于晚商中原王朝主动地交流和掌控?除宏观视角的考察之外,将物质遗存放置于具体情境中的微观研究也有待补充。

其三,由于考古学材料客观的片面性和偶然性,面对社会和政治层面的问题时,往往需要借助相关学科的理论框架,必要时可能需要突破已有的文化框架。晚商时期中原王朝与长江中游地方方国、部落之间的关联、除文化、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之外,是否存在其他的可能。比如以获取当地铜矿、硬陶、原始瓷器等资源为目的而形成的某种关联模式?要回答这样的问题,还需要补充合适的理论依据。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进程都具有重要价值。然而,书中也有部分认识需要继续讨论或寻找更多证据支持。

其一,有些性质存在争议的重要遗存暂未形成可信的推论,而这也影响到对当地社会形态的认知。比如湖南晚商青铜器能否依据考古学文化分区进行细化分群,如何判断这些青铜器群的使用年代在晚商还是西周时期,归属于哪个考古学文化?晚商时期洞庭湖水系区是否存在本土陶器生产,使用情况又如何?又比如鄱阳湖水系的吴城文化发现吴城、牛城这两座城址,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布局结构特殊的吴城遗址究竟是方国都城,还是具有手工业生产或祭祀等专门用途的邑等等。

其二,早商时期中原王朝在长江中游的直辖区,给当地社会带来从文化、技术到意识层面的全面冲击和影响,直至晚商时期长江中游流行的本土器物仍保留早商时期的技术或风格,这部分书中也有论及。问题在于如何区分,哪些是早商时期影响在当地时段内的传承和演进所导致的,哪些是出于晚商中原王朝主动地交流和掌控?除宏观视角的考察之外,将物质遗存放置于具体情境中的微观研究也有待补充。

其三,由于考古学材料客观的片面性和偶然性,面对社会和政治层面的问题时,往往需要借助相关学科的理论框架,必要时可能需要突破已有的文化框架。晚商时期中原王朝与长江中游地方方国、部落之间的关联、除文化、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之外,是否存在其他的可能。比如以获取当地铜矿、硬陶、原始瓷器等资源为目的而形成的某种关联模式?要回答这样的问题,还需要补充合适的理论依据。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冲击与调适：长江中游商代文化与社会演进的考古学观察》

作者:豆海锋  
出版社:科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1年5月  
定价:268元

科技保护 环境监控、本体监测、预警评估  
科学管理 资产管理、人员管理、咨询服务  
创新服务 科技文创、定位导航、数字化采集

遗址 博物馆 发掘现场 档案馆 图书馆 旅游景区

MicroWise system 元智系统  
西安元智系统技术有限公司  
MicroWise System Co., Ltd.

联系人:张总 13572270596  
座机:029-88346362  
官网:www.microwise-system.com  
邮箱:info@microwise-system.com